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新疆研究丛书

清乾隆时期新疆的内地移民社会

Immigrant Society in Xinjiang:
Centered on People from China Proper During
Qianlong, Jiaqing and Daoguang Reigns of
Qing Dynasty

贾建飞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新疆研究丛书

清乾嘉道时期新疆的 内地移民社会

Immigrant Society in Xinjiang:
*Centered on People from China Proper During
Qianlong, Jiaqing and Daoguang Reigns of Qing Dynasty*

贾建飞/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乾嘉道时期新疆的内地移民社会 / 贾建飞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5

(新疆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097 - 3272 - 4

I. ①清… II. ①贾… III. ①移民—历史—新疆—清代 IV. ①D691.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66379 号

· 新疆研究丛书 ·

清乾嘉道时期新疆的内地移民社会

著 者 / 贾建飞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责任编辑 / 周志静 孙以年

电子信箱 / renwen@ssap.cn

责任校对 / 徐兵臣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范 迎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9.25

版 次 /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字 数 / 359 千字

印 次 /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3272 - 4

定 价 / 6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厉 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处祖国西北边疆、亚欧大陆的腹地，全区面积 160 多万平方千米，占国土面积的 1/6；周边与 8 个国家接壤，有长达 5700 千米的边界线。新疆古代时属于泛称的西域，历史上，这里是欧亚人口迁徙和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孔道。数千年历史的发展和文明的沉淀，使今天的新疆成为一处有着深厚底蕴和丰富内涵的历史文化宝地。步入近代，孤悬塞外的新疆饱受列强和境外侵略势力的宰割与欺凌，成为一部近代中国边患史的缩影。民国时期，军阀割据，贫穷和战乱严重地制约了新疆社会经济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各族人民翻身解放、当家做主，积极投身于各项建设事业中。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新疆已成为全国最有发展潜力的省区之一。

研究新疆历史的发展与变化，历来受到中外学术界的瞩目，今天，有关新疆研究的著述可谓硕果累累，十分丰富。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还有更多的研究领域等待着学者们去探讨；已有的研究内容也需要进一步深化和细化，有些需要做整体和系统的思考。此外，相关研究的基础资料和研究成果的出版也不尽如人意。而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定形势又迫切需要加强对其历史与现状的综合研究。有鉴于此，2004 年 5 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批准“新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综合项目”（以下简称“新疆项目”）立项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特别项目。项目为期 5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牵头管理，项目专家委员会组织实施。

“新疆项目”分为专题研究、档案文献整理、重要外文著作文献翻译等几个大的子项目类别。按“新疆项目”规划，凡结项成果统一由项目办公室组织专家匿名评审，评审结果达到良好以上者，由项目基金资助出版。

前 言

人类社会形成之后，或许即已开始了最早的人口流动。这种人口流动不仅促进和加速了人类在全球范围的繁衍和发展，而且，对于不同地区人类文明社会的繁荣发展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进入公元 18 世纪以后，由于工业革命在欧洲的兴起和发展，人类的科技、物质生产和消费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欧洲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结构都因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并带动起了欧洲城市化的发展及人口向城市的转移流动。同时，由于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的影响，西方国家逐渐开始大规模向外扩展，一方面是向外输送其工业时代的物质文明，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追求将西方的主流文化向全球推广。由此又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股人口流动的热潮。欧洲人大规模向非洲、美洲、亚洲、大洋洲等流动，这就是西方以殖民扩张为标志的历史上空前的一次人口流动时期。这些都导致 18 世纪在欧洲历史上具有独一无二的重要性。事实上，对于欧洲以外的很多逐渐沦为欧洲人殖民地的国家和地区而言，18 世纪同样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因而，18 世纪也逐渐成为包括欧洲历史研究在内的一个独立研究领域。人们往往以“漫长的 18 世纪（long eighteenth century）”来概

括其所涉时段（大致在 17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与影响。^①

同一时期，正处于满洲人所建立的清朝统治之下的中国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在康熙、雍正长达 70 多年的统治之后，中国的历史在 1735 年步入了乾隆统治时代，乾隆之统治一直延续到了 18 世纪末。在康雍乾以及其后的嘉庆统治下的 160 余年间，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达到顶峰，尤其是 18 世纪成为中国近代早期最有活力的一个时期，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它主要反映在，清朝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人口的大幅增加，向内陆亚洲的领土延伸以及自马嘎尔尼（Macartney）使团来华而引发的欧洲人的逐步到来。^②同样，在这一时期，人口流动也达到了中国有史以来的最高峰。其原因主要如下：第一，清朝领土不断扩大。自康熙至乾隆时期，清朝先后将台湾、蒙古、青海、西藏和新疆等内陆亚洲边疆地区置于自己统治之下，领土的大幅度扩大为人口流动创造了客观条件。第二，人口急剧增加。至乾隆后期，人口已经从 1700 年的 1.5 亿增加到了 1800 年的 3 亿多。人口这种爆炸性的增长自然会对人类社会和人类的生存环境形成巨大的冲击，而且也导致物价日涨。这也引起了包括清帝在内的很多清人的深切关注。正如清人陈宏谋所谓，“米价日增，原非一时顿长，实由生齿日繁”^③。湖南巡抚杨锡绂亦称，“米谷之贵”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户口繁滋”。他指出：“康熙年间，稻谷登场时，每石不过二三钱。雍正年间，则需四五钱。今

① 参见 Mark C. Elliott, *Emperor Qianlong, Son of Heaven, Man of the World*, Longman, Priscilla McGeheon, 2009, p. 1, “Author’s Preface”; 韩书瑞 (Susan Naquin)、罗友枝 (Evelyn Rawski): 《十八世纪中国社会 (Chinese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之“序言”，陈仲丹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第 3 页；并可参考曼素恩 (Susan Mann) 《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 (Precious Records: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定宜庄、颜宜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② 韩书瑞、罗友枝：《十八世纪中国社会》之“序言”，陈仲丹译，第 1~2 页；约瑟夫·弗莱彻 (Joseph Fletcher): 《1800 年前后清代的亚洲腹地 (Ch’ing Inner Asia c. 1800)》，见费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刘广京 (Kwang-ching Liu) 编《剑桥中国晚清史 (1800~1911 年)》上卷，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第 39 页。

③ 《清高宗实录》(五) 卷 316，乾隆十三年六月癸亥，第 197 页。

则必需五六钱，盖户口多则需谷亦多。”他还指出，“虽数十年间，荒土未尝不加辟，然至今日而无可垦之荒矣”^①。应该说，当时很多人都对此有一定的认识。^② 第一，这迫使人口不可避免会由高密度地区向低密度地区流动。第二，如前文所述，疆域的不断扩张也为人口的流动和荒地的开垦等创造了客观有利条件。第三，虽然伴随着人口的增长，清朝的社会经济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是，正如孔飞力（Philip Kuhn）所言，这“不意味着老百姓可以致富或生活会变得更加安全，反而因为在一个充满竞争并十分拥挤的社会中，生活空间更小了”。也就是，经济的增长并不能够抵消人口的巨大增长。尤其是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严重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安全。

俗语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各地发展的巨大差异自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区间人口流动的发展，促使人们往往从生存条件差的地方向相邻的条件较好或是机会较多的地方流动，借以谋取好的发展。^③ 这也就是较为重要的人口流动动机。自19世纪始，西方即有不少学者开始进行研究。英国人拉文斯坦（E. G. Ravenstein）最早提出了他的移民法则（The Laws of the Migration），强调移民地对移民的吸引力因素。至20世纪，先后经过赫伯尔（R. Herberle）、李（E. S. Lee）和博格（D. J. Bogue）等人的研究分析，最终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善的移民理论，即强调从拉力和推力两个方面来探讨影响移民迁入和迁出的因素^④，

① 《清高宗实录》（五）卷311，乾隆十三年三月癸丑，第99～100页。同卷中，许多官员都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见第95～106页。

② 可参见唐文基《乾隆时期的粮食问题及其对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3期。

③ 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第40～43页。

④ E. G. Ravenstein, The Laws of Migration, *Journal of the Statistical Society of London*, Vol. 48, No. 2 (Jun., 1885), pp. 167-235; E. G. Ravenstein, The Laws of Migration,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Vol. 52, No. 2 (Jun., 1889), pp. 241-305; 朱国宏：《中国的海外移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第11～12页。

其实主要就是强调移出地和移入地之间的差距对移民的影响。虽然这一理论并不能完全概括人口流动的真正动因，但大体上可以对人口的流动做出较为合理的阐释。

在清代，这种主动或是被动的人口流动的方向因地区不同而存在差异，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但主要是由内地各省向西南边疆、台湾和新开发的内陆边疆地区流动。如福建人的流动目的地多为台湾，湖广之人目的地主要是四川等西南地区，山东、直隶之人向东北流动，而陕甘之人则是向新疆流动的主力。而且，人口的流动规模也日益扩大化。^①

18 世纪左右出现在中国的这种人口流动现象对于近代中国的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故 18 世纪于中国历史之重要性渐为学者关注。如今，一些学者在研究 18 世纪的清史时，也借鉴了欧洲历史中的这一“漫长的 18 世纪”的概念，其所涉范围在 1680 ~ 1820 年，前后跨越康、雍、乾、嘉四朝。

二

对于不同地区间的这种人口流动，清政府总体上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支持态度，尤其是对于那些在中心地域之间的人口流动，如所谓的“湖广填四川”。但是，对于中心地区与新并入清朝版图的内陆亚洲边疆和台湾等地之间的人口流动，清朝则因地域不同，采取了较为不同的管理政策。

清朝的领土扩张，导致中心地区和边疆地域均在不断外延。譬如，在清朝统一新疆之后，乾隆即指出，“前因准夷未平，凉州、庄浪等处，

① 华立：《清代甘肃·陕西回民的新疆进出——乾隆期的事例を中心に》，塚田誠之編「民族の移動と文化の動態——中国周縁地域の歴史と現在」，風響社，2003，第 20 ~ 67 页。

为西陲冲要”，而今大功告成，巴里坤以西自伊犁至叶尔羌，“向日之边陲，又成内地”，则所有凉州、庄浪之地，不得作为边界。^① 也就是，在明代本为边徼之地的河西地区，至清朝统一新疆后，其边疆功效已然消除，成为无须重兵驻防之内地。虽然时人对于当时的这种边疆与内地角色的转变依然存在疑虑，并未能在心理上立即或是完全接受这种转变，但是，这种转变毕竟还是不可逆转地发生了，且日益为后人根深蒂固地接纳。^②

相较中心地区的人多地少，边疆地域（如东北、台湾、蒙古和新疆等地）人口稀少，经济发展较为落后，而且，很多地区又属甫经统一之地，人口大量减少，其社会经济急需重建，朝廷之统治亦需加固，故清政府也需要通过中心地区与边疆区域之间合理的人口流动来开发这些边疆地域，并巩固朝廷的统治。

但是，鉴于这些所谓的边疆地域多属不同于内地汉文化圈的异文化区域，清朝作为一个由人口较少的满洲所建立的王朝，在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统治上有很多不同于汉王朝之处，更为注重保持边疆民族的自我认同和独立发展，因此又不希望汉人和汉文化过多浸染这些地区并影响到这些地区居住民族的利益。另外，人口的频繁流动及因此而致之经济社会生活的差异性、人口比例中的性别失调以及政府政策的不确定因素，往往导致许多社会问题的产生，尤其是不同文化和地域背景下的群体（包括流动人口与土著群体、流动人口之间、统治阶层与平民阶层之间）的冲突，因此，在这些人口流动频繁的新开发地区往往较易发生各类犯罪行为。严重者甚至会对中央政府在边疆地区的统治产生消极的影响。因此，如何管理内地民众，维护边疆社会的稳定也是清政府边疆经营中

① 《清高宗实录》（八）卷 601，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甲戌，第 748 页；（九）卷 677，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甲寅，第 575 页。

② 有关这种转变，可参见贾建飞《清代中原土人西域观探微》，《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3 期。

重点考虑的问题之一。

因此，为了增加边疆地区人口，开发边疆地区社会经济，并维护清朝对这些地区的统治，同时还要达到减少这些边疆地区的犯罪活动，维护这些地区的社会稳定的目的，清政府对于内地人员向这些新开发之地，尤其是非汉人聚居之地的流动采取了一些特别的措施。一方面并不完全禁止内地人口向这些地方流动，另一方面因地制宜，针对地区间的这种人口流动出台了一些有针对性的限制措施，主要是围绕携眷与否而展开，也就是围绕是否允许这些人口长期定居流动目的地而展开。譬如，在台湾地区，对于大陆流动人口的进入，先是限制其携带家眷，后又放开，又因社会问题而禁，屡禁屡开；在东北地区则一贯禁止汉人的流入，只不过这种封禁政策并未取得清政府所期待的效果；蒙古地区则是允许内地商民持路票前往，但不得携眷。相较之下，新疆的情况又为不同：清政府在统一新疆之后，即鼓励内地民众携眷前往北疆一些地方发展垦殖、贸易和其他经营活动，不过对于北疆一些游牧人口聚居之地和南疆维吾尔人聚居之地，清政府则只允许内地男性只身前往，禁止他们携带女眷。

总体而言，这些新开发的边疆地域，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往往较中心地区要多，故容易对外来人口产生较强的吸引力。这些流动人口对于这些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于巩固中央政府对这些地区的统治亦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在这一人口流动浪潮中，内地向新疆进行的人口流动由于规模较小、资料记载不详等而常为研究中国移民史之学者忽视。如在郭松义的《清代人口流动与边疆开发》^①、葛剑雄的《中国移民史》^②、田方等主编的《中国移民史略》^③等著述中，由于作者之意在于从宏观上梳理历史上的

① 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10~51页。

② 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

③ 知识出版社，1986。

中国移民问题，只是将清代的新疆移民置于整个中国移民史或是清代移民史的范畴中进行论述，故对清代新疆移民问题的论述往往失之过简。

就目前中国学者已有的对清代新疆移民问题的研究，曾问吾较早对此问题进行了关注，他在《中国西域经营史》^①中主要从中央王朝对新疆的统治政策角度出发，较为简略地谈及了清朝在新疆的移民屯垦；其后，有关移民屯垦问题的研究层出不穷，其中以王希隆的《清代西北屯田研究》^②和华立的《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③最为突出。蔡家艺的《清代新疆社会经济史纲》^④以及华立的一系列文章^⑤集中关注了内地人在新疆的社会经济活动及其对新疆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⑥而齐清顺的《1759—1949年新疆多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⑦主要论述的则是内地各族军民向新疆的流动历史及其对近现代新疆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此外，还有一些研究关注的是清政府有关新疆移民政策的发展变化。^⑧

在移居或是流向新疆的内地人口中，由于地域的影响，汉、回是其

① 文海出版社，1978。

② 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

③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

④ 人民出版社，2006。

⑤ 如《乾嘉时期南八城的内地商民》，马大正主编《西域考察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第373～390页；《乾隆年间移民出关与清前期天山北路农业的发展》，殷晴主编《新疆经济开发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第97～123页；《清代の天山南路に進入する内地商民——人口移動と辺疆地域との視点》，《地域と社会：大阪商業大学比較地域研究所紀要》第二号，1999，第123～144页；《清代の玉石交易と新疆社会》，瀧泽秀樹编《東アジアの国家と社会——历史と现在》，お茶の水書房，2004，第161～205页。

⑥ 此外，相关研究情况还可参考林永匡、王熹编《清代西北民族贸易史》，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阚耀平：《清代天山北路人口迁移与区域开发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刘卓：《新疆的内地商人研究——以晚清、民国为中心》，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薛宗正主编《中国新疆古代社会生活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

⑦ 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

⑧ 如贾建飞《试论清中期的南疆经略政策——以对内地人的政策为中心》，《欧亚学刊》第5辑，2005。实际上，上述很多研究或多或少亦涉及了清朝的相关政策。

中较为重要的两个群体。在现有研究中，多数研究关注的都是汉人群体，华立则利用清代满、汉档案文献，对清代新疆的内地回族移民群体的移民背景，移民来源地，移民阶段之划分、职业分布和社会经济活动等予以了较为翔实的研究。^①

相对而言，对于这些内地人在新疆的社会经济生活、内地移民的地域文化对新疆文化发展的影响、内地移民在新疆的犯罪活动及清政府的管理、人口流动对清朝新疆经略政策的影响等方面，国内学者的研究还较为薄弱。

国外学者对于清代新疆的内地人以及清政府的相关政策等也有一些研究。如日本学者羽田明较早关注了南疆的内地人的情况^②，片岡一忠则研究了清人对内地人移民新疆的认识及清政府的移民政策^③，村上信明主要关注的是乾嘉时期清政府针对内地人在塔尔巴哈台地区进行金矿开采的政策。^④ 在美国学者中，米华健（James A. Millward）对内地人在新疆的经济活动以及内地人与新疆当地民族（主要是维吾尔族）的关系进行了一定的论述，濮德培（Peter Perdue）在其著述中则涉及了内地人

① 参见华立《从福康安〈奏稿〉看清代丝绸之路上的流动人口——乾隆年间甘肃回民迁移新疆三十例浅析》，马大正等主编《西域考察与研究续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第83～98页；《清代イリにおける民人社会の形成とその諸相》，窪田順平・承志・井上充幸編「イリ河流域歴史地理論集 —ユーラシア深奥部からの眺め—」，松香堂，2009，第107～140页；《清代甘肃・陕西回民的新疆进出——乾隆期の事例を中心に》；“Materials in the *Manwen Lufu* regarding Hui Muslim Migrants to Xinjiang”，in *Studies on Xinjiang Historical Sources in 17 - 20th Centuries*, edited by James A. Millward, Shinmen Yasushi, Sugawara Jun, Tokyo: The Toyo Bunko, 2010, pp. 218 - 236。

② 羽田明：《異民族統治上から見たる清朝の回部統治政策》，東亞研究所編《清朝の辺疆統治政策》，至文堂，1944，第103～203页。

③ 片岡一忠：《清朝統治新疆研究》，雄山閣，1991。

④ 村上信明：《乾隆・嘉慶期における新疆北部ダ爾ダムトウ山金鉱の開採問題》，窪田順平・承志・井上充幸編「イリ河流域歴史地理論集 —ユーラシア深奥部からの眺め—」，松香堂，2009年3月発行，第83～105页。

在新疆的屯垦活动。^①

三

事实上，尽管清代前往新疆的内地移民在数量、规模上相对不如其他边疆地区，如东北、台湾等，但其对新疆的开发、新疆社会的发展变化，尤其对清朝的新疆经略政策以及近代中国西北疆域的最终形成和稳定等均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汉、唐、元三代皆曾统治今天的新疆地区，然而其新疆经略政策均告失败；唯独清代，自乾隆中期统一新疆并对其实行有效统治后，虽亦曾经历诸多边乱和波折，但清朝并未放弃对新疆的统治，最终在新疆设省，使新疆成为中国疆域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究其成功因素，与内地人口不断向新疆进行流动存在非常密切和直接的关系。

乾隆中期，清朝统一新疆。经历战乱之后的新疆，尤其是北疆，人口稀少，社会经济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同时，西北域外还面临着诸强大游牧政权和俄国的威胁，国内也对清朝的西北用兵存在广泛的质疑。因此，如何开发新疆经济、维护朝廷对新疆的统治是清廷统一新疆后面临的迫切问题。而吸引内地移民正是清廷的解决之道之一，以此来开发新疆经济，最终达到实边的目的。故内地移民对于清朝在新疆的统治而言意义重大。除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影响外，内地移民对于清代新疆的社会文化的发展，尤其是对新疆与内地的文化交融、减少地域文化差异、改变时人的新疆观（或西域观）和促进新疆与内地的行政一体化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① James A. Millward, *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 - 1864*,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eter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鉴于南北疆情况不同，清政府对内地人的移民政策也颇为不同。在北疆，由于经历战火后的北疆原有人口大为减少，几乎是“千里空虚，渺无人烟”^①，所以清政府积极鼓励内地人携眷移驻北疆的乌鲁木齐、巴里坤和伊犁等地，但不得携眷移驻游牧部族聚居之地，如塔尔巴哈台。之所以鼓励移民，一方面为发展屯垦，开发新疆的社会经济，满足军粮供应；另一方面也为增加北疆的人口，充实边储。可谓一举而两得之事。^②

相比之下，清政府对于内地人向南疆的流动则采取了颇为不同的政策。在经历了四个世纪相对有限的相互交流后，清朝统一南疆使得中国进入了一个与亚洲大陆另一个主要文明——伊斯兰文明的直接和长期的新的交流时期。^③ 相对而言，伊斯兰文明对于清政府较为陌生，清政府也缺少统治这样一种文明社会的经验，而历史上又无成功经验可供借鉴。因此，为避免滋生事端，清政府将南疆并入版图之后，基本上没有改变南疆原有的统治模式和统治制度，而是因俗而治，以其人治理其地，清朝只是派少量军队驻扎南疆。同样，清政府也没有像在北疆那样，鼓励内地人携眷移驻南疆。虽然清政府并不禁止内地人前往南疆，但是，禁止他们携眷前往。这种限制也适用于驻防南疆的清朝官兵。之所以如此，还是出于稳定统治之意，避免过多移民的进入影响当地民众的利益，进而滋扰地方安全。客观上，这种政策最大限度地维持了南疆伊斯兰社会的封闭性。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清政府对伊斯兰文明和南疆社会日益熟谙，且伴随着南疆逐渐爆发的反抗和反叛活动，这种政策逐渐得到调整，并最终在道光时期得到较大的改变，驻防官兵和内地民众亦可如北

① 七十一：《西域闻见录》卷1，《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民俗文献》第1册，兰州古籍书店，1990，第166页。

② 《清高宗实录》（一一）卷877，乾隆三十六年正月戊辰，第747页。

③ Mark C. Elliott, *Emperor Qianlong, Son of Heaven, Man of the World*, p. 99.

疆之例，携眷前往南疆。此举对清朝在南疆的稳定统治以及新疆最终实现新疆行政上的一体化等都起到了较为积极的促进作用。

四

本书主要针对乾嘉道时期新疆的内地流动人口进行研究。这一时期，不仅是内地人口向新疆流动之始，而且发展较为迅速，至道光时期达到顶点。其后开始衰落，直到左宗棠重新收复新疆后方得以复苏。

对这一时期新疆的内地流动人口进行研究，难点在于可供利用的资料非常有限。新疆系新近统一之边疆地区，缺乏内地的文化传统，故内地常见之方志、家谱和碑刻等重要文献资料，在新疆却难以得见。仅有之作，对于平民之记载亦属稀少，只能作为背景的参考文献。不过，在一些涉及犯罪活动的相关档案中往往会保留那些涉案者的相关信息。故犯罪档案逐渐成为研究平民的社会生活以及政府对他们实行的管理的重要资料来源。^① 遗憾的是，拥有丰富平民资料的浩如烟海的“刑科题本”，收录的基本都是有关内地各省的犯罪档案，几乎没有来自新疆的犯罪档案记录。所幸，在数量较为丰富的清代满、汉档案（宫中档朱批奏折、军机处满文和汉文录副奏折）中，留有上千件与平民相关的刑案

① 譬如片岡一忠（Kataoka Kazutada）《刑案资料上清朝的回民政策》[《史学研究》（日本东京）136，1977]和《刑案资料上清朝的回民政策补说》[《历史研究》（日本大阪）21，1986]；赖惠敏等：《情欲与刑罚：清前期犯奸案件的历史解读（1644-1795）》（《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1998年第6期）和《但问旗民——清代的法律与社会》（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郭松义：《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商务印书馆，2000）；王跃生：《清代中期婚姻冲突透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苏成捷：《晚期中华帝国的性、法律和社会》（Matthew H. Sommer, *Sex, Law,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美〕步德茂（Thomas M. Buoye）：《过失杀人、市场与道德经济：18世纪中国财产权的暴力纠纷》（*Manslaughter, Markets, and Moral Economy: Violent Disputes over Property Right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张世明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资料。虽说其内容较刑科题本中的刑案内容而言，失之过简，然而对于本研究却属弥足珍贵，已经足以给我们提供有关这些内地流动人口的很多信息。所以，这些刑案资料以及其他一些方面的档案^①是本书最为倚重的文献来源。

此外，清代历朝实录和有关新疆的各种方略^②，部分政书类著述^③，仅有的一些方志类以及私人著述^④等，也是本书的重要参考文献。至于西方人的游记，由于所涉年代相对较晚，故对本书的帮助并不大。

基于清代满、汉档案史料和相关官私文献，本书主要论述了乾隆中期清朝统一新疆后，至道光时期，内地人口向新疆的流动、清朝对人口流动的认识和管理政策、内地人口在新疆的社会经济活动，以及内地文化随人口流动在新疆之发展等问题。

在第一章中，主要阐述了清政府的新疆经营理念，并论述了缘何陕甘成为新疆移民的主要来源地，清朝针对内地人移民新疆的政策及其发展变化，以及内地移民的不断增多对清政府在新疆统治制度和官制的影响。

① 譬如，已经公布的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中华书局，1994）；《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台北“故宫博物院”印行，198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帝起居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马大正、吴丰培主编《清代新疆稀见奏牍汇编（道光朝卷）》（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那彦成：《那文伊公奏议》（《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等等。

② 如傅恒等编《平定准噶尔方略》（《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史地文献》第10册，兰州古籍书店，1990）和曹振鏞等纂《钦定平定回疆剿擒逆匪方略》（文海出版社，1972）。

③ 如《钦定回疆则例》，《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续编·西北史地文献卷》第5册，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

④ 如永贵、固世衡原撰，苏尔德增撰《新疆回部志》（见《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民俗文献》第2册，兰州古籍书店，1990）；七十一：《西域闻见录》；王希隆：《新疆文献四种辑注考述》（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中的部分文献；格琿额纂，吴丰培整理《伊江汇览》；佚名：《伊江集载》；永保纂，马大正等整理《总统伊犁事宜》（均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清代新疆稀见史料汇辑》，全国图书馆缩微文献复制中心，1990）；和宁：《三州辑略》（成文出版社，影印本，1968）；和宁：《回疆通志》（文海出版社，1966）；以及杨建新主编《古西行记选注》（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中收录的部分文献等。

第二章和第三章主要介绍的是内地人在新疆的经济活动。内地人来到新疆后，除了由政府组织移民关外的那部分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从事商业贸易。鉴于现有研究对此类人多有研究，因此这两章主要关注的是内地人的其他一些经济活动，如矿产开发，新疆的煤矿和金矿的兴起、发展与内地人的活动密切相关；农业耕种，此处主要涉及的是在新疆租种地亩者；内地人不断来到新疆，对新疆的房屋市场是个巨大的促进，歇店、房屋租赁和借住等形式多样的房屋市场对于满足内地人在新疆的基本居住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最后，通过对涉及汉人的经济犯罪案例的分析，探讨了新疆流动人口在新疆的经济状况。

第四章主要以新疆涉及内地人犯奸活动为主要线索，分析了犯奸者的社会地位和家庭背景、犯奸者的社会关系、犯奸者的杀人动机、内地人与其他族群尤其是维吾尔人之间的犯奸行为及清政府对此之政策，进而探讨了携眷问题和性别失调对于犯奸行为的影响，同时介绍了新疆色情业的发展。

第五章首先结合了清政府在新疆的文化政策的发展，尤其是语言政策、戏曲政策和科举政策等，着重论述了内地人向新疆的流动所带来的内地文化的同步西进，尤其是内地坛庙在新疆的发展及其对内地人的重要心理影响。

结论部分重点探讨了三个问题。第一，内地人向新疆的流动对新疆民族关系的影响。笔者认为尽管清代新疆曾经发生过很多的变乱，甚至也发生过内地人与维吾尔人之间的仇杀，但并非人口流动所直接导致。在总体上，清政府的这种人口流动政策基本上是成功的。第二，人口流动、边疆开发及其清代新疆的生态环境的影响。笔者指出，这种人口流动对新疆的开发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同时，对于新疆的生态环境也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虽然就短时期而言，清代的人口流动与环境的互动